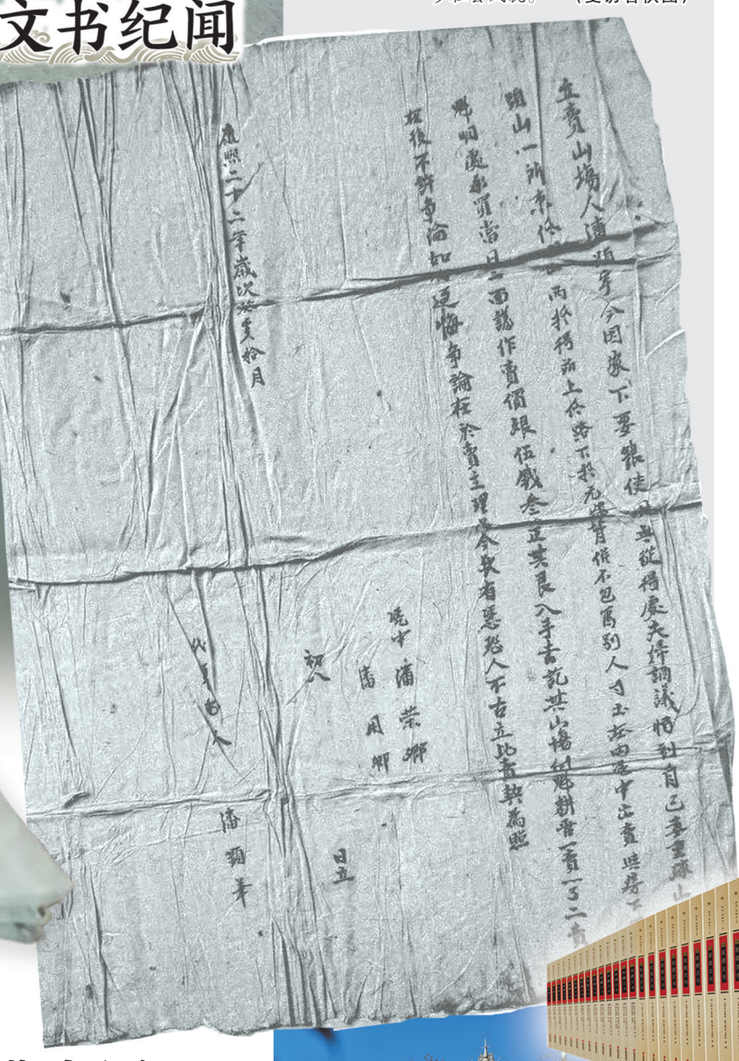
文化中国行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清水江文书纪闻



清水江流域。李斌 摄（影像贵州）



从潘家文书可窥见17世纪苗乡社会风貌。（受访者供图）

10月的悉尼，阳光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与语言学院的窗户斜切进来，将空气中细小的尘埃照得无所遁形。学院教师黄智雄看着这几乎有些霸道的明亮，脑海里却想起两个月前，中国贵州清水江畔的另一种阳光——它是碎的，被层层叠叠的杉木枝叶筛成无数细小的、颤动的斑点。

今年8月3日，汽车从锦屏县城出发，黄智雄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看路绕着山走。车窗外，一边是时隐时现的清水江，一边是苍翠绵延、通直高大的杉木。作为清水江流域分布最广、最集中的树种，在黄智雄眼里，它们密又高，仿佛要把天撑起来。

过去10年间，因为研究清水江文书，这位澳大利亚学者几乎每年都要来到清水江流域，开展田野调查。而说起与清水江文书的相遇，黄智雄觉得有些偶然，但真正下定决心深入研究，则源于某种直觉。

融媒报道 请扫码观看



黄智雄在天柱翻看村民家谱。（受访者供图）

澳大利亚学者在清水江文书里读懂中国

一江故纸叙交融

本报记者 曹雯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惊讶

2016年，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的黄智雄第一次来到黔东南州天柱县。在这座位于清水江北岸的小县城里，他惊讶地发现，当地苗族家族竟然有几座300年历史的祠堂。

这个惊讶，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但对深耕英语学术界多年的黄智雄来说，几乎是对既有认知体系的颠覆——在西方学界的主流叙事中，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曾被认为是“原始的、无文字、无历史”，有学者甚至认为，苗族是为了远离王朝的管控，而放弃文字和定居农业的族群。

“一个民族地区能有这么多民间契约保存，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是未被触及的全新领域，就连我的导师也没有听说过。”在黄智雄的学术认知中，中国宋明理学的父系传承，一直与汉族亲属制度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天柱县的苗族家族也会建立祠堂？这些散落在清水江流域的民间文书，能否说明这个地区如何被纳入王朝体系？

黄智雄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两个问题逐步推进。

他先在图书馆里翻阅了22册《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专挑那些看起来“不一样”的仔细研读。那些比别的地方更早的，不只是山林土地买卖，还包含家谱或其他类型的家族文书，正是黄智雄的兴趣所在。在他看来，与锦屏县的文书相比，天柱县的文书出现得更早，内容多集中在农业、赋税和家族谱系。

从2018年到2020年，黄智雄在天柱县做了大约4个月田野调查，与当地人一起生活。他做访谈，参加婚礼、葬礼和节日活动，拍摄了上千页文书以及数百块碑刻和墓碑。最终，黄智雄锁定了潘家文书作为研究对象。

汉字的文书，苗族的习俗

今天的天柱县、锦屏县，是清水江流域的宗祠文化重镇。其中，天柱县的历史遗存宗族祠堂达128座，现存保存完好的77座，飞檐翘角、青砖灰瓦，在杉木林与稻田之间静静矗立，被誉为“西南家祠文化宝库”。

“南有鼓楼、北有家祠”，这既是贵州侗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俗语，也是对当地文化地理格局的一种精炼概括。以三门塘村的刘氏宗祠为代表的天柱县宗祠，融合了侗族“款约文化”、苗族“议榔文化”以及汉族的宗族文化。但这些都不是黄智雄关心的重点，他更想知道这么多宗祠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成规模地出现。

答案藏在18世纪清水江流域的一场深刻转变里。

清雍正年间，朝廷在西南展开“开辟新疆”的军事行动，鄂尔泰下令疏浚清水江以供给驻军口粮。由此带来商业性林业贸易兴起，大量白银流入清水江流域。到了清乾隆初期，“苗里”的农田经历土地丈量，苗户开始以“摊丁入亩”的方式交税。国家力量不再只是遥远的背景，它通过赋税、丈量、司法和军事，一寸一寸地嵌入西南苗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黔东南州天柱县三门塘村的宗祠巡游活动。罗显澄 摄（影像贵州）

黄智雄在田野调查中曾拍摄到一份文书，详细记载了潘氏族谱的来历。1771年，潘亦炜与潘见山从今属湖南、位于河流下游的中方前往天柱，将族谱副本交给当地潘家。他们在天柱停留近一个月，其间受到盛宴款待；返程时，天柱潘家赠予银子与猪油，潘亦炜嘱托他们妥善保管族谱。此时，距潘家在天柱有土地和墓地已数十年。黄智雄认为，族谱来得并不早，但来得正是时候，“它让一个已经在此扎根的家族，有了一套可以向上追溯、向外连接的身份叙事。”

随着潘家把家族成员，包括各房各支、婚姻关系、墓地位置写进一本汉文族谱里，家族的第一座宗祠也在嘉庆年间建了起来。原祠在1867年中被毁，又于1907年由族人重新动员修建。祠堂的兴废，几乎成为潘家300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为什么一个苗族家族要采纳这套“入谱”的汉族制度？黄智雄的解释是：18世纪时，天柱县的家族采纳“典范宗族”的组织形式，是因为这最符合他们当时的切身利益和世界观。因此，“入谱”不只是记录血缘，更是采纳一套被王朝国家认可的社会组织形式，入国家之谱、入正统之谱。

但“入谱”并不是将少数民族文化特质消解。黄智雄在文书里找到了更深层的秘密。

潘家族谱里没有节妇记载，却有多例寡妇再嫁的记录；女儿从母亲“下堂”也照样入谱；寡妇刘桂娥改嫁张家后，儿子仍将她的遗骨迁回娘家埂冲，潘家还在族谱中记下墓地位置，让子孙继续祭祀。这些做法与宋明理学的父系继嗣规范明显不同，却与当地苗族的婚姻习俗和清代官府文书、民族志记载相吻合。

在这位澳大利亚学者看来，尽管潘家入了谱，但谱里写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用汉字、修族谱、建祠堂，却保留寡妇再嫁、姑舅表亲通婚、母亲“下堂”后仍归葬娘家等地方传统。“他们把族谱当作一种有用的制度，主动选择、为我所用，同时在里面安放自己不肯放弃的那部分世界。”黄智雄说。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雨水从那高高的枝叶间漏下来，将整片山林都浸在一种绵密的水声里。黄智雄觉得眼前时隐时现的清水江恰如一条时间的长河，它接纳所有汇入的支流，却从不要求哪一条支流改掉自己的颜色。汉字的契约、侗族的款约、苗族的议榔，都在同一条江水里流淌，各自带着各自源头的温度。

普通契约里的17世纪苗乡社会风貌

黄智雄研究的重心，是天柱县潘氏家族300年来的亲笔文书。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立于1683年，即康熙二十二年。

“立卖山场人潘显宇，今因家下要银使用，无从得处，夫妇商议，将到妻重嫁山场土名元头山一所……凭中出卖与房下侄儿潘魁明处承买，当日三面议作卖价银伍钱三分正……一买一了，二卖二休，在后不许争论……立此卖契为照。凭中潘荣卿、潘用卿，代笔书人潘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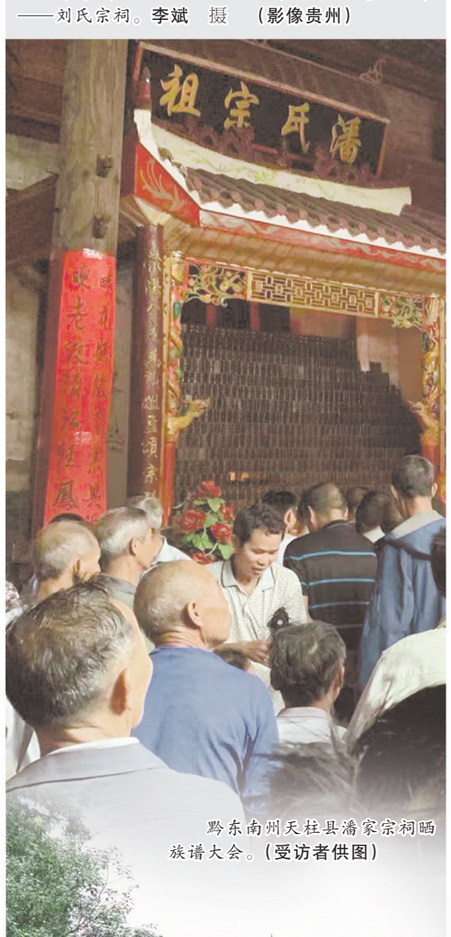
这份契约文书看起来似乎很普通。但在黄智雄眼里，却处处透着不寻常。首先，它立于1683年，显示潘家此时已在从事林业，并且使用契约。其次，潘家虽然定居在“苗里”（天柱县内的非汉族聚集地），使用的汉文名字却体现了父系亲属关系；而且至少代笔人潘显华是识字的。最后，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处，即“夫妇商议”四个字。文书里潘显宇卖的是妻子随嫁的山场，说明妻子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对其使用有一定发言权。

这份文书除了对苗族使用文字历史的颠覆，同时也直接印证了当时学界的一个流行假设，即清水江流域的家族、契约和股份，并非18世纪才突然出现。在黄智雄整理的潘家契约表里，从1650年到1717年，潘氏家族内部的土地交易一场接一场，几乎所有的农田都以股份形式持有。

一个更深的疑问在黄智雄脑海中随之而来。既然潘家17世纪就在使用契约文书，为什么祠堂、族谱、公共墓地这些“典范宗族”（中国宗族的标准形态）的标志，直到18、19世纪才出现？



黔东南州天柱县三门塘村的宗祠建筑代表——刘氏宗祠。李斌 摄（影像贵州）



黔东南州天柱县潘家宗祠晒族谱大会。（受访者供图）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徐晓光：契约文书牵出一部民生经济史

本报记者 黄若佩

“清水江文书是学术富矿，我们要有这个自信，把清水江学推向世界。”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徐晓光表示，孔学堂书局出版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这套民间文献应成为贵州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徐晓光回忆，他与清水江文书的缘分可追溯到2007年。彼时，张新民教授团队对清水江文书的系统整理研究刚刚起步，专程到凯里学院交流，他便是在那次接触中亲历了这项研究的开端，一路见证这套文献从酝酿到问世的历程，“如此繁杂的文书整理考释，拿出这样的大部头，本身就是文献整理的一个标杆。”

谈及下一步如何深化研究，徐晓光认为，首先应拓宽研究视野，跳出区域局限。他分析道，清水江木材经沅江入长江、再经大运河一路抵京，沿途钞关档案、官方文书极为丰富，“要善于利用沿江、长江、运河上的档案进行对比研究，把清水江放进全国水路贸易网络里来定位。”

徐晓光特别强调官方档案的挖掘价值。“曾有贵州学生在北京查阅档案，仅用几条资料就解决了一个学界争论多年的问题。”在徐晓光看来，清水江文书的价值，只有与当时的工部采木记录、户部税关簿册等全国性官方档案相互印证，才能充分彰显。

“此外，研究切口也要多元化。”徐晓光说，清水江木材并非只有建筑一项用途，造船、运河桩木、烧炭等都是大宗需求。而都柳江流域农民烧炭外销的线索若能深挖，便能从契约文书中牵出一部民生经济史。

徐晓光表示，清水江文书的契约形式、林业习俗深受徽州文化影响。“比如‘生女栽树’这一被许多人视为苗侗独有的传统，在徽州婺源县志中也有记载，这正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徐晓光教授。（贵州大学供图）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本报记者 吴蔚 摄

鼓楼深处的汉腔侗韵

本报记者 曹雯

“学术灵感枯竭的时候，就来瑶白看看。”这是流传在中山大学清水江研究团队的师生中的一句笑谈。

位于小江上游半山腰的瑶白村，是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的下辖村寨。古时候这里曾多民族混居，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北侗文化。2014年，瑶白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2017年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浓绿如墨的山林深处，有一座侗乡木构建筑戏台青瓦如鳞、飞檐翘角，层层叠叠的塔状屋顶下浸透着一种清水江流域特有的、陈年木料与湿润泥土混合的气息。瑶白村梨园太和班第三代掌坛师杨安亚正是这座古老戏台的“掌灯人”。小学6年级能将《空城记》全本倒背如流，1990年接过掌坛师的重担，30多年来，他在这方戏台上粉墨登场、演尽悲欢，也在这里口传心授，将瑶白大戏的香火一点点传续给村里的后生。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瑶白大戏并非随意的市井娱乐。杨安亚介绍，当年龚文昌的祖辈从江西带来汉戏文脉，村里人又沿着清水江去湖南学戏，为的是“招龙”。“他们学成归来后创办梨园太和班，其中‘梨园’一词承袭汉戏正统文脉，‘太和’则为了祈愿民族和睦、风调雨顺，希望村民们能够团结起来。”

此后100多年间，瑶白大戏只在春节会演、摆古祭祖、招龙祈福或还愿时才登台。戏台上，以戏叙史、以戏传情，演绎三国、隋唐、宋辽传统正本，创编乡土故事，承载迁徙记忆、族群规约、家国道义，演出形式则以西皮、二黄、高腔为骨架，融入北侗山歌润腔，武场配侗族牛角、唢呐、围鼓，形成了独一无二“汉腔侗韵”。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刘彦2013年初次来到瑶白村开展田野调查时，便被这方水土的美丽与动人惊艳。10多年来，她多次走进瑶白村展开人类学研究。在刘彦眼里，从明清至今，整个清水江社会都在与时俱进，地方性社会十分活跃。随着“汉字入边”，清水江流域的苗侗居民用汉字写契约、编族谱，意味着儒家文化在此成为公共文化；而瑶白人用侗话唱汉戏，则是这片土地对汉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转化。“这群苗侗乡土社会中的能人贤士，以文化为中介，用一台大戏完成了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联通。”

尽管瑶白大戏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但20世纪70年代村里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诸多珍藏剧本，瑶白大戏里的18种唱腔亦有失传的风险。为了保住这门绝活，20世纪80年代，村民们硬是扛着最结实的杉木，顺流而下，换回了浙江永康的戏服。

在村支书滚明焰看来，过去梨园太和班翻山越岭地去邻县展演，每次演出都记入传承谱系，不断增强参演村民的文化认同。2017年，瑶白大戏首次登陆黔湘桂三省侗戏邀请赛便获得特别奖，此后也多次在黔东南州的传统戏剧展演中获得好成绩，这大大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自信。今年7月19日，瑶白大戏非遗传习所揭牌；9月5日，非遗传习培训班的30多名学员在杨安亚等传承人的带领下，系统学习脸谱绘制与18种唱腔。

“如今逢年过节，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打电话回来询问什么时候开始彩排大戏，剧本和台词的传习，可以通过微信开展线上教学。”滚明焰说。

从过去“师父一个一个教”的模式，到如今“办班系统化教学”的新探索，杨安亚在戏台上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他不仅教授年轻人剧目里唱腔的精妙之处，还给他们讲大戏的历史。在这方见证了百年时光交错的鼓楼戏台上，瑶白大戏恰似山林深处的一部史书，在皮黄声腔和侗乡音韵里，传唱着清水江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长歌。



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鼓楼戏台上一出瑶白大戏正在上演。何琪怡 摄

杨安亚和梨园太和班的弟子们。（瑶白村供图）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蔡桂莉 安刚